

电影艺术的重塑与激活——2014年中国电影艺术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

中国电影即将走过110年的旅程,许多突出的电影发展现象和一些在电影艺术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电影,恰巧都在2014年出现。分析中国电影在当前遭遇的转变,评论影片创作的优劣,并进而带出一些关于中国电影路向方面的讨论,颇具价值。

一、电影类型化与国产文艺片的新发展

2014年,中国电影业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2014年我国故事影片产量618部,同比减少20部;全国电影总票房296.39亿元,同比增长36.15%,其中国产片票房161.55亿元,占总票房的54.51%。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出现了重要的变化。作为历史新时期的迅猛发展,中国电影呈现持续的市场繁荣和快速提升,创作视野不断拓宽,其中,电影类型化和国产文艺片及其包含的导演个人性诠释等正逐渐形成较多维度的理解和故事策略,电影市场遭际也形成不同结果。

电影的类型化发展呈现多样性的表现,执影院与市场的牛耳。2014年,不仅出现了《西游记之大闹天宫》、《心花路放》等过10亿元票房的华语大片,一鸣惊人,而且《智取威虎山》、《澳门风云》、《窃听风云3》、《白发魔女传之明月帝国》、《熊出没之夺宝熊兵》、《救火英雄》、《无人区》、《北京爱情故事》、《绣春刀》、《一个人的武林》、《京城81号》等,也获得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

2014年,全年票房过亿元影片共66部,其中国产影片36部,全年城市影院观众人次达到8.3亿,同比增长34.52%。但在5年前,全年过亿元国产片才有11部,2013年只有33部。2014年过亿元票房电影中,有历史片、喜剧片、警匪片、动作片,也有爱情片、青春片、武侠片、励志片、公路片、灾难片等,类型丰富。其中喜剧片《西游记之大闹天宫》、《心花路放》、《分手大师》等影片在类型元素、风格、故事、人物等方面,较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加上突显粉丝影响力的青春爱情时尚片《后会无期》、《小时代3》,近现代历史题材影片《智取威虎山》、《太平轮》(上)以及《一步之遥》等,悉数上阵,古装武侠片则明显减少,电影创作的市场反应机制与作品所具有的内涵,较2013年有了新的变化和发育。

国产文艺片 and 严肃电影创作取得好成绩,好口碑持续发酵。国产片《归来》、《黄金时代》、《白日焰火》、《亲爱的》、《夜莺》、《蓝色骨头》和《推拿》等片,都获得了比较好的口碑与票房成绩。陈可辛的《亲爱的》,表现血浓于水的亲情加人性表现,口碑好,市场表现不俗。张艺谋的《归来》的全国总票房为2.84亿元。《黄金时代》剧情真切、语言质朴,影像表现精致细腻,票房虽未过亿元,但在业内口碑较高,是电影界的“正声雅乐”。作为小众电影,《黄金时代》观众比商业片观众仍显偏少,而且观众年龄偏大,但它不同于一般的商业类型片或娱乐片,创文艺片票房新高,已是本年度的亮眼成绩。

二、中国与好莱坞：电影的转换、选择与位移

近年,在产业与市场发展进入快车道的同时,国产电影与好莱坞的竞争呈现激烈态势。

2014年度暑期档票房累计超90亿元,同比增幅超55%。在暑期档期内,国产/进口片票房分布为44:46,国产片在“档期保护”下仍败下阵。在银幕数与日俱增的情况下,市场发展潜力与场次容纳量持续爆发,好莱坞与中国电影的竞争激烈、紧张和胶着。第一季度国产片一度获得市场份额的60%以上,但到第二季度结束,国产片份额却因为《变形金刚4》的上映跌至50%以下。排片、观影在按照市场化方式运作与演进。《变形金刚4》上映首日的全国排片约5万场,据言有影院“恨不得排片100%”。暑期档里国产影片特征鲜明,类型多样,国产片与进口片碰撞、交流,国产片占据上风。其后的形势与发展脉络却仍以好莱坞领先,《星际穿越》等片的多重影响自不待言,进口片在2014年内地影市的表现依然坚挺,其所持有强大的市场号召力挥之难去。虽然国产片的过亿元票房总数呈现增长态势,国产片票房市场占比也略胜进口片,但如何寻找更多的突破口以与好莱坞抗衡,无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国内的电影市场环境复杂,兼具好口碑与票房的国产片并不多。

在全球化语境下,电影寻求“国际化”发展,中外影视合作得到拓展,“走出去”渐成气候。在2014年国内近300亿元的总票房,国产影片海外销售收入仅18.7亿元,同比增长32.25%。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外国有经验丰富的制作团队,中国电影发展迅速,资金实力雄厚,市场发展很快,国家政策推动和主导下的中外电影合作,对国产电影的发展起到强力推进作用非常重要,而中外在影视文化产业合作方面势将大有可为,把影响带到相关国家和好莱坞,前景可期。

三、多媒体时代的追索与超越

中国电影产业对于高科技和新媒体的应用越来越普遍,数字化的拍摄、制作、放映的影片数量正不断增加,互联网和电影发展的关系及趋向受人瞩目。现在,数字传输、放映已经逐步取代传统的胶片发行、放映,数字银幕、3D银幕以及数字巨幕逐渐成为市场主流,针对数字电影的制作、发行、放映、传输、运营管理和技术支持等服务体系也已经走上正轨,数字技术对我国电影产业的支撑、引领作用开始显现,并且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西游记之大闹天宫》(3D)在市场上的成功,与其利用观众家庭观影的口味订制有关,也与影片制作数年磨一剑、后期制作的各项技术都被数字带和数码技术所取代、利用3D实现高票房都有重要的关联。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以及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对影视产业产生了重要的助推作用。2014年2月26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上述顶层设计的指向:使用以数字技术为主体的高科技手段,以互联网为基础来进行媒介融合。当下,某些互联网公司已经成为市场重要投资主体和院线品牌,其中乐视最具代表性,具有互联网基因的新电影品牌纷纷刷新了国产电影票房纪录,如2013年至2014年乐视的《小时代》三集电影票房超13亿元。而其“乐视TV·超级电视”如同一个自己公司独特的节目机顶盒一般,拥有5000多部电影和9

万多集电视剧的资源。乐视网除所有的电视剧已经同步卫视播映,越来越多的电影也将实现与院线上映发行准同步,对视频直播行业具有开创创意。

2014年起,以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与电影行业,关于互联网与电影的战略合作、并购、融资纷至沓来。本年,腾讯再次发布了全新的“泛娱乐”战略。阿里巴巴介入影视业,成立影视公司,百度倚重旗下爱奇艺整合、开掘电影业务,也已浮出水面。关注新媒体对中国电影创作现状、美学形态以及业态整体发展的影响、挑战与作用,势在必行。

四、重市场轻艺术，当下电影如何体现文化自觉

2014年春节,投资仅500万元的小成本电影《爸爸去哪儿》再次创造了中小成本电影的票房奇迹,在众多的质疑声中,轻取5亿元票房。虽然有人说影片《爸爸去哪儿》根本不算电影,但是市场对国产片的多样化的需求趋旺,当下国内电影“市场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高端影院,而电影生产的工业水平还远远没有跟上”,中国电影市场处于优秀电影供不应求的阶段,所以《爸爸去哪儿》靠同名娱乐节目的热播占得商机,另外,有的影片凭宣传和档期的优势大赚一笔,属难以避免。

观察2014年电影业的发展,一些偏差和存在的问题搭乘市场化这趟顺风车,已将部分电影生产以至电影业的发展拉向迷途,举其大者,主要有:一、指导思想存在偏差,有关机构管理上有较为明显的误区。市场发展与艺术创作关系处理上,问题日趋增多,我们如何真正重视起来,去努力解决好,是当务之急。二、具有人文性以至正确价值内涵的有质量的作品匮乏,直面历史的反思精神从第五代到年轻一代电影中踪影难觅。三、主流商业电影一味迎合市场,过度痴迷于笑点的设计,注重调动和刺激观众的情绪,让影片流俗为一出出热闹的喜剧秀。四、电影批评缺乏引领,弘扬正能量明显不足。影视评论未能产生更大影响。改变理论滞后的现象,势在必行。

当代电影如何体现文化自觉,追求创新实践,直面现实生活,反映时代精神,值得我们深入反思。怎样把握和分析历史,怎样看待过去与当下的联系以及怎样将这种联系清楚明晰地呈现给观众,是电影书写和呈现历史需要正视的重要命题。在重塑社会、历史记忆的过程中,提供作为面对现实并向未来挺进的原料,作为报答、影片会赋予观众更多的代入感和投入感,更为从容地引领观众抵达彼岸。

我们全面发展、卓越发展的电影,优质的电影,好的电影环境,应该融入新的思维,“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故事,而这也是实现电影的中国梦的必由之路。加强电影业在整体上的合理布局,促进其数量、类型、内容等方面的多种可能性,使中国电影在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强和新语境新条件下完成色彩斑斓的华丽转身,前景可期。

(本文据中国艺术研究院院内课题《2014年度中国电影艺术发展研究报告》摘编而成,执笔:丁亚平、储双月)

潮音阁

戏曲批评是呈现戏曲美学精神、总结戏曲创作经验、促进戏曲发展的有利因素,这是戏曲从其成熟之际就已经被不断证明的事实。在中国戏曲的发展历程中,理性、健康、深刻乃至具有引领性的批评,总与成功的戏曲创作相伴而行。

尽管如此,限于中国戏曲在数百年间附属于文人仕宦、巨商豪贾的养乐历史,以及戏曲艺人屈居社会底层的身份特征,加之戏曲班社长期接受官方管理的体制束缚,戏曲批评不乏在对戏曲社会功能的批判与贬之间取舍,也不乏在对伶人追捧与捧唱之间游移。这就造成了诸多非理性、非科学化的批评习气至今相沿不绝,诸如取悦于人情物的评论、违心于红色的评论、掣肘于长官权威的评论,乃至唯众取宠、刻意于标新立异的评论等,便很容易地被孕育出来。同时,随着近代以来对戏曲传统的批判之风兴起,搬用政治与道德的话语霸权,套用其他艺术领域的理论观点、套用西方文艺理论的只言片语,来粗暴地否定戏曲、批判戏曲、曲解戏曲的批评之风,亦常见于当前的戏曲批评界。

戏曲批评在当代出现的诸多问题,与中国戏曲数百年来文化生态密切相关。我们呼吁批评者要有独立思考,敢于超越社会壁垒,直面创作中的问题与成绩;呼吁艺术批评要一针见血、专业公正,能够舒展戏曲自身的魅力;呼吁戏曲创作者要尊重批评,由此实现批评对创作的良性推动……这些固然需要规避长久以来阻碍戏曲批评的不良风气和体制束缚,但最重要的还是要确立属于中国戏曲的美学体系,建构符合中国戏曲艺术规律的批评体系。这是摆在戏曲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戏曲批评体系要以中国戏曲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作为基础。早在明代中叶,汤显祖就在其《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一文中,标榜戏曲之“道”,并将之与儒、释、道为内核的文化正统相提并论。戏曲之“道”是戏曲艺术发展的精神指标,对于演员,“道”是音乐、表演、体验等舞台艺术本体的美学呈现;对于剧作家,“道”是思想、文学、结构在戏曲艺术中的深度表达;对于观众,“道”是审美、娱乐、民俗交融于戏曲艺术的经验诉求。戏曲之“道”,即是戏曲作为民族表演艺术的终极价值。因此,戏曲艺术演而有“道”之时,戏曲形态得以完善,戏曲与传统礼乐文明得以契合。戏曲批评应该立足于中国戏曲的这种历史传统,通过独特而规范的舞台呈现,超越时代精神的经典创造以及符合民众审美需要的生态建设,促进戏曲稳定传承和有序发展。

戏曲批评体系要秉持历史层累的演剧经验与批评理论。中国戏曲艺术是开

放而不断更新的体系,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历经古典戏曲、近代戏曲、现代戏曲等不同阶段,历久弥新,古典与时尚并存。古典戏曲崇尚礼乐相偕,歌、舞、乐、诗融为一体,乐论、舞论与文论交相呼应,奠定了戏曲艺术的理论基础;近代戏曲标榜技艺功法,唱、念、做、打极尽渲染,技艺之学与伶人之评互为表里,形成戏曲艺术的内行之学;现代戏曲张扬时代理性,中西演剧观念共同彰显戏剧表演的体用相宜之理。正因如此,在传统戏曲基础上,又出

现了改编戏、新编戏、现代戏、实验戏、城市戏曲、新创剧种等多元的艺术探索,创作理论更趋繁盛。即使如此,基于从古至今积累起来的艺术规范,搬用程式而注重个性化的艺术体验,塑修身段而注重整体性的美感呈现,凸显明星主角而注重多元行当的团体配合,恪守传承法则而注重创新发展艺术追求,始终是中国戏曲秉持的本体精神。戏曲批评应该以中国戏曲的本体精神为内核,将历史层累的批评理论予以体系化建构,以此来指导戏曲创作和戏曲的发展方向。

戏曲批评体系要涵盖中国戏曲丰富的文化品格。中国戏曲是庞大的表演艺术体系,不但在汉族戏曲中包括了多元声腔衍生的戏曲剧种以及目连戏、雉戏等宗教戏曲形态,和木偶、皮影等借助媒介表演的戏曲样式,而且还有少数民族戏曲形态,加之丰富的地域文化与大量演员对于戏曲的创造,在诸多艺术样式中又孕育出丰富的地域个性与艺术流派。在已经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总计162项列入传统戏剧类,涉及306个艺术样式(其中皮影、木偶共61个),另有豫剧秦派、越剧尹派、高甲戏潮派3个流派。这尚不是中国戏曲的全部体量。众多的戏曲样式以其文化多样性,形象地展示出各具特征的文化品格,弥足珍贵。正缘于此,戏曲批评不能是一种理论、一种模式、一种声音,而应该呈现多元化的中国戏曲艺术及其理论体系,这是多元的戏曲文化品格的必然要求。

近一百年来,在急速变迁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中,中国戏曲的众多剧种及艺术形态不但每每到外来文艺理论的裁剪,而且基于对主流戏曲的盲目学习来进行艺术的自我阉割。那种小戏向地方大戏看齐、地方大戏向京剧等主流大戏看齐、京剧向话剧等外来戏剧看齐的风气,自然影响到戏曲批评每以单一的理论来束缚多元的中国戏曲。

显然,中国戏曲亟须体系鲜明的理论建构,戏曲批评要承接源远流长的中国戏曲精神,要用民族文化的活话体系来张扬丰富多彩的戏曲艺术品格。这是每一个戏曲理论批评者的责任。

王 旭

戏曲批评需要『体系』建构

客观地说,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三农”题材文学的典范文本,路遥《平凡的世界》较为集中地表征出胶着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农民主体的成长轨迹。无论这些农民的人生际遇如何差异,但至少有一点是他们所共同具备的:已经完全不同前辈作家笔下的农民形象,他们都具有强烈的主体性特征;这种主体性不仅体现在他们对历史与现实之复杂性征的审视与批判之上,也体现在他们对自身的弱点和局限的深刻反思和自我审视层面。这些成长的农民主体如孙少安、孙少平等,以极具深刻性的精神思辨,极具个性化的自主选择,活跃于当代特殊的乡村(城乡)生产生活空间之中,见证(回忆)了错综复杂的家国历史,直面(思考)着鲜活芜杂的乡村现实,并经历重重磨难创造着充满希望的乡村未来。在他们身上,聚集着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依附与独立、保守与创新等相互对立的精神脉动。

众所周知,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特殊的历史语境下,城乡分治的二元制度所加于农民身上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匮乏,更是精神世界、内在心理的残缺;它在城乡之间、工农之间搭建起一个具有巨大裂隙的二元世界,并决定着农民的地位、家庭、婚姻、交往、情感乃至心灵的向度。在此种意义上,《平凡的世界》展示的是当代中国历史语境下城乡分治之中的主体突围,以及此种农民主体性的成长过程:一种是以孙少安为代表的扎根乡土、离农不离乡,经由艰苦的自主创业,最终实现财富的增长和精神的裂变;另一种是以孙少平为代表的“离土、离乡、离农”,同样经由艰苦的探寻,实现

《平凡的世界》：

农民主体的现实突围与精神掘进

彭维锋

了自我的追求和纯粹精神的蜕变。如此,紧紧围绕着土地及其生存生活方式,孙少安、孙少平成为一个时代构建农民主体性的一个镜子的两个面向。更进一步讲,孙家兄弟事实上是对路遥《人生》高加林故事的合理延展:孙少安实现物质富裕的过程,孙少平谋求精神突围的过程,实际上是对城乡二元模式的一种决绝的抗争,也表征着在特殊的社会历史境遇下当代农民的路向选择。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上世纪80年代特殊的历史语境下,当我们的作家和作家笔下的角色处于城乡二元社会强大的制度困境之时,很难实现对这种制度本身的直接性的批判与挑战、抗争与颠覆。他们只能求取迂回战术,揭示并认识这种制度,在现行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以自我奋斗的方式,潜在地表述对制度的某种反思。因此,无论少安、少平选择的道路有多大差异,二者具有共性的事实是:以理性之力量 and 果敢的精神,直面现实处境并谋求超越现实。

孙少安是一个类似于柳青《创业史》梁生宝般的角色,但又在发展中显示出差异性。一方面,他身上有着浓厚的传统中国农民的影子和品质。他恪守传统中国农民的道德规范,他厚重朴

质、安土重迁、任劳任怨、老成持重、甘于奉献,他勇敢承担起家庭重负,勇于担起队长职责,敢于直面自己的贫困处境,他热爱这片土地,他的婚姻、情感、事业、人生价值都紧紧地与这片土地联系在一起;他将辍学务农供弟妹读书视为天经地义,他热爱集体并踏踏实实想法搞好集体工作,他拒绝了青梅竹马但已跳出农门的田润叶的爱情,他在婚姻的选择上以勤劳本分能干为标准。他极力反对对妻子秀莲的分手要求,他在创业受挫甚至破产后仍然千方百计借钱去偿还村民。

另一方面,孙少安又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农民所具有的品格。他扎根乡土又不囿于乡土,生于贫困又不甘于贫困,他具有善于思考,不甘平凡、果敢坚韧、勇于开拓、创新求变的精神。倘若我们反观孙少安的一切努力,在事实上他都渴望在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私与公、情感与理性、欲望实现和道德净化之间,建立一种富有张力的、动态的、弹性的平衡。而正是这种对当代农民而言极为可贵的品格,决定了孙少安遭遇城乡差别、生存艰难、极左势力、乡村惯习和创业失败等种种困难时的姿态,也才决定了他扎根于乡村的发展道路。在日常的农业生产活动中,他发现了农

业集体劳动的弊端,冒着风险率先实行了家庭承包体制;在一次简单的运输交易中,他发现了农民跳出农业走向富裕的道路,他以智慧的头脑和大胆的运用抓住了发展的机遇;即便遇到了近乎破产的后果,他依然一次又一次穿越动摇、迷惘、痛苦、烦闷的迷雾,直面现实所有的苦难和艰难,在千辛万苦之中重新踏上充满希望并最终收获成功的创业之路。

较之于孙少安,孙少平是一个更具有现代性和理想性的人物。同少安一样,他身上也具有中国传统农民的优异品质,但与少安相比,他身上洋溢着鲜活的时代精神,他的视野更开阔,意志更坚韧,理想更远大,思维也更敏锐。生存的艰难困窘及其造成的心理阴影在他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但却没有阻挡他谋求自我发展的道路,反而成为他一步步实现自我的铺路石。从吃“非洲馍”的穷苦学生,到浪迹街头的打工汉子,再到钻研矿洞的煤矿工人,孙少平依凭坚韧的品格、独立自主意识以及高擎的理想大纛,始终在自我奋斗的人生道路上不断探索着自己的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事实上,农家子弟孙少平背井离乡奔赴城市或远赴异地,并非是为

了逃离乡土,其目的是为了逃离一种固有的抑或常规化的生活方式,是为了突破传统农民身上所具有的安土重迁的小农思想与狭隘观念,从而实现一种富有冒险性和理想性的精神突破。

对于一个当代青年农民而言,孙少平没有遵从命运既定的安排,没有选择传统的扎根乡土的务农之路(或类似孙少安式的创业之路),而是听从内心的(哪怕是冲动的、盲目的)呼唤,踏上了一条属于自我实现的、独立自主的、不断进取的、极具个性化的发展之路。从实用理性的角度考量,无论是物质收获和个人荣誉,还是长远规划与发展前景,孙少平背井离乡去城市揽工、去矿山挖煤,远远比不上和哥哥孙少安一起兴办企业。但对于农村知识青年孙少平而言,这些外在层面的、像物质、荣誉等种种需求,并不是最主要和最重要的(虽然这是他一度特别是成长时期备受煎熬的问题),他所需要的是一种突破农民既定生活方式的探索:这种探索的前途是未定的,它有着强烈的情感动力,有着极为主动的自我设计,有着隐隐约约甚至盲目之至的未来指向,有着浓重的理想的影子……说到底,孙少平高中毕业之后所走的道路带有强烈的

主观性、主体性、实验性和理想性,支撑他踏上这条未知之途的,是一种强烈甚至略显偏执的主体性力量,这种力量促动一个农村青年突破“安土重迁”的既定生活方式,突破一种固定的农民生活的常规路径,突破一种因循守旧、保守陈旧的精神心理图式。在一定程度上,孙少平的意义就在于他的思想与行动是一种深刻的改革与嬗变,他改变的并不侧重那些形而下的现实性的物质生活,而是一种形而上的心理转变与精神革命,他要为游离于“城乡交叉带”的千万个农村青年树立独立自主的精神坐标,要超越既定的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二元空间和二元选择,探寻一条勇于直面现实、勇于精神突围、勇于进取、勇于自我实现的发展之路。

无论如何,《平凡的世界》为我们勾勒出一种当代中国农民甚至超越农民属性的生存道路。孙家兄弟直面自己的现实生存境况,坚定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艰难但又不无决绝的选择了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从而也建构起了不同的人生取向、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的农民主体空间。在这条自我奋斗、自我坚守、自我磨砺的道路上,他们的持重和偏激、失重与恒定、倾斜与平衡、迷惘与痛苦、狂妄与虚浮、亢奋与低沉、放纵与节制、缺憾与丰富,这一切,都可以在他们所生活的并与之抗争的社会、历史、文化、精神的元素中寻求到相应的诠释。甚至可以说,在路遥的笔触中,生存的主体性以及生命的意义与价值,那种平凡之中的责任、情怀、理想和精神,对今天的中国乡村乃至整个中国,仍然具有无限魅力的魅力。

(作者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新农村文化研究所所长)